

文章编号:1009-315X(2014)06-0580-08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东北 少数民族村寨研究

王 艳

(大连民族学院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 要:对20世纪20年代乡村社区研究兴起以来涉及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起步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阶段以及80年代至今的繁荣阶段。在论述各阶段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后续研究需要研究者有效兼顾民族志书写和理论剖析两个方面,从而实现对研究对象更为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和探究。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Ethnic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 1920s

WANG 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thnic village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 1920s when the study on rural communities started. Basically, the research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initial stag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as well as the stage of prosperity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paper advances that the follow-up researches on the ethnic villages in Northeast China require researchers to effectively combine writing ethnograph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order to make the object of study understood more comprehensively,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Key words: The 1920s; Northeast China; ethnic village; review

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社区”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功能主义理论学派的影响下,吴文藻提出“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

费孝通、林耀华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微型社区研究,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研究,从而使中国的社区研究更具本土化特色和内涵。此后的诸多研究者均秉承民

收稿日期:2014-05-02;最后修回日期:2014-06-3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CMZ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ZJ13RWYB027, ZJ13RWYB030)。

作者简介:王艳(1982-),女,河北张家口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性别研究。

族学社区研究的传统,对那些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有着共同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地域性群体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学界将这些兼具地域性、民族性、社会性的社会共同体定义为民族社区^[1]。其中,少数民族村寨属于小型的乡村民族社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村寨为单位的乡村民族社区如何应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所研究的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但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以西南、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较多,研究领域和内容也更为广泛,体系也较为成熟,而关于东北地区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社区研究兴起初期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数篇,且不成体系。本文试图对自20世纪20年代乡村社区研究兴起以来东北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活动进行简单集中梳理,勾勒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村寨研究的历史发展图景,从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一定基础。

一、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国外学者中最早到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的是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他早在1895年就到辽东半岛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于1919年、1920年、1928年三度对西伯利亚东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的各民族聚居区进行了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他的《蒙古及满洲》(1915年)和《黑龙江和北桦太》(1943年)两本著作均为对东北地区多次调查的资料总结^{[2]61-62}。1932年,伪满洲国同江县公署参事官庄村谦吉所著的《同江县事情》,收集了当时赫哲族的一些生产、生活、习俗和教育等资料。1939年,日本人永田珍馨在伪满洲国治安部参谋司调查科工作时所搜集的调研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使鹿鄂伦春族》(中译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对当时驯鹿鄂温克人的分布、人口、体质、语言、教育、风俗、信仰、生产、交易等现状进行了较为真实的记录^[3]。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又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关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并在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总的来说,此阶段日本人对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的民族学调查,大都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目的,以便为殖民

统治政策的制定服务^[4]。

研究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并深入民族村寨进行细致的民族学调查的俄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他于1912年-1913年对中国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1915-1917年期间,他又多次对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并相继出版了两部关于北方民族社会组织的著作。

其中,《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的英文版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1年日译本在东京出版,1985年由吴有刚、赵复兴、孟克结合日译本再次译为中文,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作者基于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本民族学专著,书中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氏族分布、氏族组织和职能、婚姻、家庭、财产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做了全面的阐述,为之后学界关于鄂温克、鄂伦春族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民族志资料。

1924年,《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的英文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97年高丙中将其译为中文出版。史禄国在书中重点对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满族群体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认为“与在中国内地和南满相比,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远离汉族人故地的区域寻觅古代的形式(forms)更易取得丰富的成果”^[5]。此书内容丰富,对满族的民族称谓、历史发展、氏族组织、婚姻家庭、经济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中国学者针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正规的民族学调查于20世纪20年代全面展开。当时,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将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1924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赴东北地区进行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主要地区为松花江下游等处的依兰、桦川、富锦、同江、绥远、饶河、虎林、宝清、密山、穆稜等县。实地调查时集中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聚居地区,即“自依兰至抚远一带”,调查历时三个月。调查结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

于1934年出版。这本调查报告被称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2]168-169}。书的内容包括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赫哲族的文化、赫哲族的语言和赫哲故事四个部分,展示了赫哲族的历史和现状发展全景,尤其在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大量的中国文献记载和国外研究著述,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国外汉学家关于赫哲族族源的错误论断。这表明我国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从学科建立、发展之始便提倡重视历史文献研究。在当今民族村寨研究中,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分析民族村寨的发展现状仍应成为探索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途径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凌纯声的这部关于东北赫哲族的民族志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

此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原计划在1932年“赴北满调查鄂伦春人及索伦(鄂温克)人,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失陷,事实上已不能进行”。于是改为调查浙、闽的畬族,以弥补前次调查的不足^{[2]172}。

以上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和俄罗斯学者对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的研究和调查相对较多,而国内学界关于东北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央政府的民族工作正式全面展开,这有效地带动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村寨的研究工作。1950-1952年间,中央政府派遣了四个中央访问团分别前往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地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6]51}其中,中央访问团东北内蒙古访问团于1952年7月组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访问了蒙古族、朝鲜族、回族、满族、锡伯族、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民族,深入各民族聚居的乡镇和村寨,举行慰问大会50次,向60多万各族群众传达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慰问^[7]。

1952年底,中央访问团的访问工作结束。在

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尽快改善国内繁杂的民族成分、混乱的族称状况,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央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研究工作,大批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历时八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1964)开创了我国民族学界关于民族村寨调查研究的良好开端,不仅为国家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也为民族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调查成果至今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其中,内蒙东北调查组由民族史学家翁独健担任组长,并依据调查对象的民族不同进行了分组,如内蒙古调查组分为四个组,蒙古族组(包括两个小组)、达斡尔族组、鄂伦春族组、鄂温克族组;黑龙江调查组分为赫哲族组、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组、朝鲜族组、满族组和回族组五个调查组;吉林调查组分为朝鲜族(包括四个小组)、满族、蒙古族、回族七个小组;辽宁调查组共分七个组,其中三组负责调查满族,另有三组分别负责调查朝鲜族、蒙古族和回族,还有一个史料搜集组^{[6]167-168}。同时,调查组也得到了地方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配合。如,黑龙江省的调查组由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教师、学生和干部组成,1958年8月至12月,先后对黑龙江省的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赫哲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调查。1959年又进行了补充调查^{[6]198}。

调查组在深入民族村寨调查期间,与被调查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民族村寨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研究报告。1957年5月至7月,内蒙古东北部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族小组,在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居住的额尔古纳河地区,进行了40天的调查和观察,初步写出了《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对被认为当时“尚过着游牧的生活,基本上还保存着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的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情况、经济、社会组织、习俗和精神文化进行了叙述和分析^{[10]171}。同时,调查组针对调研期间发现的问题也提出了改

进意见^{[6]214}。

此次调查地域遍布全国,所得资料也极为丰富。以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搜集的文字资料为例,他们在两年的调查中,“直接调查所得的材料共有286万字,搜集、翻译的档案资料共有174万字,其中达斡尔分组直接调查的材料有100万字,搜集、翻译资料58万字;鄂温克族分组直接调查的材料有81万字,搜集、翻译资料10万字;鄂伦春族分组直接调查的材料有105万字,整理、翻译档案资料106万字”^{[6]207}。此次调查所搜集的资料被编写为《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即《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

1960年,内蒙古东北调查组结合史志丛书的编写又对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地区进行了关于社会形态的补充性调查。比如,1960年秋对额尔古纳河畔游猎的鄂温克人“乌力楞”进行了调查,编写了《额尔古纳旗鄂温克族社会补充调查——鄂温克族调查材料之五》;1963年夏,对鄂伦春自治旗木奎村、爱辉县新生村、逊克县新鄂村和新兴村进行了调查,编写了《鄂伦春自治旗木奎高鲁(村)补充调查报告——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九》《爱辉县新生村补充调查报告——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逊克县新鄂村补充调查报告——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一》和《逊克县新兴村调查报告——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十二》^{[8]102}。尽管此次补充性调查的时间较短,但仍不失为一次关于东北地区民族村寨实地调研的成功范例,它不仅为完善东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为今后在东北民族地区开展民族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套丛书的基础上又增加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丛刊》,将其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这套丛书原版共计402本,1亿多字,内容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及民族经济、民族文学、宗教、医药、体育、舞蹈、绘画等多种学科,可以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百科全书^[9]。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的资料和数据大多是于五六十年代初期深入民族村寨调查搜集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计有84种145

本,详细描述了当时各地区民族村寨的民族来源、迁徙和变化,政治环境、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是了解中国各民族村寨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是民族研究、教学等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相关的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有7本,分别是《黑龙江省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和(二)。然而,此版本的《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由于种种局限,存在体例版本不统一,有些解释不准确,没有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变化等不足^[10],国家民委于2005年对原版丛书进行修订,在原版的基础上补充史实,修订错误,增加注释。修订后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364本,由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统一出版。其中,涉及到民族村寨研究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计86种147本,东北地区民族历史调查资料除以上提到的7本之外,又增加了《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

总的来说,此阶段的东北民族村寨研究依附于中央民族工作的开展,具有鲜明的政治任务属性;且相关成果更侧重于对民族村寨的历史文化进行宏观的民族志式的浅层描述,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三、繁荣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间有许多日本学者到东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撰写了著述。北海道大学和札幌大学的池上二良在1989年访问了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和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奈良国立文化研究所主任浅川滋男在1995年至1996年也曾三次访问黑龙江省,回国后撰写了长篇调查报告《东北亚通古斯满语族诸民族民居历史调查研究》(住宅学术年刊,1996年)^[3]。同时,国内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些以北方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发展为主题的著作。如吕光天的《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孔繁志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等。

90年代开始,以东北地区民族村寨为对象的研究工作继承了老一辈民族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继续朝着规模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著作。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和发展调查”,目的是客观地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各项事业的现实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意见。课题组首次选择了具有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背景的14个少数民族作为调查对象,对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尤其是90年代以后相关民族社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在具体的田野点选择上,调查组选择两至三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进行调查,每个乡(镇)再选择两至三个村(寨),通过问卷等方式进行入户调查^{[8]103-104}。可以说,此次调查是继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学调查,有力推动了中央政府全面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的计划工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国内学界以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为关注热点的民族研究工作。调查的部分成果被编为“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由民族出版社统一出版。丛书每卷以行政区划和族别为书名,内容分为“综合篇”“典型篇”和“专题篇”三个部分。其中,“典型篇”主要是基于课题组深入到村寨牧区、农牧民家庭等进行实地调研所搜集的第一手材料撰写而成的,并针对民族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然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民族研究工作的重心主要在我国西部地区,而东北地区的相关研究并不突出。因此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大多位于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西部地区。至2008年,出版的17卷书中仅有3卷以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分别是郝时远、张世和、色音、李茜编写的《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满都尔图等的《龙井市朝鲜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以及郝时远、任一飞的《新宾县满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00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对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便为政府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此项研究工作的开展与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的积极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早在1987年就曾到东北鄂伦春地区进行过调查;1999年夏,费孝通前往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和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作出工作论文《小民族、大课题——从赫哲族说起》^[11]。调研回来后,他建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几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建议很快被纳入国家民委2000年的工作计划,并得到迅速实施。调查工作从2000年7月开始到2001年1月结束。各调研组运用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共调查了几十个县(旗),走访了上百个自然村寨,入户调查近千户。调研所搜集的材料最终形成了一份综合性调研报告和24个分民族调研报告。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4个民族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分别是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赫哲族。由麻国庆担任组长的黑龙江和内蒙古组,对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进行了调研。在鄂伦春族的调查中,调查组深入到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7个猎民村,对170余户猎民进行了户访调查;此外,调查组在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走访了6乡3镇14个村,抽样入户调查42户;赫哲族的调查点主要在赫哲族聚居的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八岔两个赫哲族乡和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调研组成员住在民族村寨,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通过房东和村中群众,详细了解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文化习俗等情况,以及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文化、社会变迁中,人口较少民族遇到的特殊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和民族村寨的未来发展思路^[12]。

2003年,云南大学继2000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研后,又组织进行了全国范围内“以村寨为视野”的民族调查。此次调查选取了除云南省之外的32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民族村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万余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

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和1本调查工作实录。调查的成果被整合为《中国民族村寨调查》(32本,2004),《中国民族村寨研究》(2004),《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纪实》(2004)和《中国民族村寨文化》(画册,2006),由云南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调查组在东北地区选取了9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调研,这些民族均为东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即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满族、锡伯族和朝鲜族,所出版的9本《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纪实》分别是:郭建斌、韩有峰的《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刘金明的《赫哲族:黑龙江同江市街津口村调查》,李·吉尔格勒、罗淳、谭昕的《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金海的《蒙古族:内蒙古正蓝旗巴彥胡舒嘎查调查》,毛艳、毅松的《达斡尔族: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哈力村调查》,余建忠、姜勇的《俄罗斯族:新疆塔城市二工镇、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室韦乡调查》,张晓琼、何晓芳的《满族:辽宁新宾县要站村调查》,王皎、江帆的《锡伯族:辽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瞿健文、崔明龙的《朝鲜族:吉林磐石市烧锅朝鲜族村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此次调查不仅丰富了关于东北地区民族村寨的研究内容,同时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极大地拓宽了民族村寨研究的领域、视野和思路。

近年来,少数民族村寨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越发突显其重要性。为了促进民族村寨的发展,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财政部于2009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项目。至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7亿元,在全国28个省区市370个村寨开展试点,在民族村寨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年12月,国家民委颁布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计划在全国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4年1月,国家民委公布了“十二五”时期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名录,其中东北地区共计有97个民族村寨被收录其中。每个民族特色村寨每年将得到中央财政投入的50万少数民族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村寨的建设和发展。此项目的开展有效带动了国内民族村寨的研究工作。

除上述研究之外,国内学者关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民族村寨的社区变迁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以及文化调适过程等方面。张跃、何明的《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基于四年左右的田野调查,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54个少数民族村寨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历程和经验,通过“以小见大”的社区研究方式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途径。书中对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三个民族村寨变迁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而对赫哲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四个民族村寨改革开放以来的生计方式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郝亚明、包智明的《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选择东北通辽地区的四个蒙古族村落作为研究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单位,透过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体制、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小见大,以微见著”地展示了特定时空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马戎、潘乃古、周星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中收录了两篇以东北地区蒙古族村寨的经济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色音的《内蒙古牧区蒙古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调查》以赤峰市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为调查点,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讨论和分析了草原牧区蒙古族村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迁。马戎的《三访府村:一个北方半农半牧社区的跟踪调查》以民族学研究特有的跟踪调查方法对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中部的府村进行了多次回访,对府村从半农半牧社区到农区的演变过程,以及蒙汉关系在文化上的融合过程进行了论述。其他相关论著还有:祁惠君的《传统与现代:鄂温克族牧民的生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包路芳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等等。相关论文主要有:麻国庆的《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13],王俊敏的《狩猎经济文化类型的当代变迁——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猎民生计调查》^[14],孙岩的《外向型经济与沈阳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15],等等。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及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式研究等方面。其中,从旅游开发、文化教育等动态传承角度研究的,如闫洁的《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深层次开发探析——以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民俗游为例》^[16],吴相利的《基于小民族聚居地旅游开发的民族文化保护战略研究——以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民族乡为例》^[17]等;从村寨文化建设角度研究的,如朴金海的《朝鲜族农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18]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19]等;以民族村寨宗教文化为研究内容的,如赵淑梅的《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的丧葬习俗及其宗教文化内涵——以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恩和村为例》^[20],郭淑云的《从“教乌云”看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教育——依据对吉林省九台市满族石氏家族的田野调查》^[21],等等。

民族村寨社会发展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民族村寨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如经济发展、生态移民、社会治理、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对策分析。杨荆楚的《东北渔猎民族现代化道路探索》^[22]一书基于对我国东北地区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和赫哲族的田野调查,探索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如何与现代化接轨,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从民族村寨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路径分析角度研究的,如苏艳的《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黑龙江省延寿县朝鲜族村为例》^[23],时春丽的《俄罗斯族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临江村为例》^[24],等;从生态移民的角度研究的,如祁惠君的《使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的民族学考察》^[25],谢元媛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后的状况调查》^[26],等;从社会组织 and 社区治理的角度研究的,如满都尔图的《鄂温克人的“乌力楞”公社》^[27],都永浩的《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28],等;从婚姻家庭的角度研究的,如何俊芳的《赫哲人的族际婚姻》^[29],包英华的《鄂温克族的婚姻家庭现状探讨——以乌兰宝力格嘎查入户调查为例》^[30]等。

民族村寨人口问题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多数以朝鲜族村寨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民族村寨人口发展现状,人口流动给民族村寨的经济产业结构、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教育发展等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诸如留守儿童、人口

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从人口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如金炳镐的《黑龙江省朝鲜族村的人口发展和变化》^[31],董玉芝的《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及其新农村建设模式》^[32],等;从由人口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角度研究的,如崔海洋的《论朝鲜族农村空心化的生态隐患——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现代社区变迁》^[33],朴婷姬的《中国朝鲜族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34],等。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以上三个阶段的东北民族村寨研究均体现了学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理念,即民族村寨作为“小传统”(以大多数乡民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传统)赖以生存、传承的重要空间,其社会变迁与“大传统”(以国家权力及知识阶层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东北地区民族村寨研究不能忽视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阶层在民族社会“小传统”发展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将其置于“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进行全面深入探讨,这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民族村寨研究的主要趋势。从研究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逐渐从社会形态研究转向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研究,在范围上更侧重于民族地区区域性整体研究,而对作为独立社区的民族村寨的具体论述仅仅作为其个案分析材料时才有所涉及,即重整体而轻个体。然而,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明显改善。学界出现了以北方少数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学者们深入民族村寨进行细致的田野工作,搜集了大量民族志材料,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此时东北地区民族村寨研究工作发展迅速。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更注重民族村寨的现状分析,以服务于民族社区的现实发展需要,而在理论研究方面仍显薄弱,即对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时缺乏解释层面的深度挖掘。因此,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后续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有效兼顾民族志书写和理论剖析两个方面,从而实现对研究对象更为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和探究。

参考文献:

- [1] 孙立平.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J]. 学海, 2001(4): 93-96.
- [2] 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M]. 昆明: 云南教育出

- 版社,1997.
- [3] 曹萌,魏曙光. 20世纪以来东北跨境民族研究述评[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71-176.
- [4] 张政,张瑞生. 20世纪中前期大小兴安岭地区中日民族学调查数据解析——鄂伦春居住集团构成比较研究[J]. 满语研究,2008(2):94-99.
- [5] 史禄国. 作者引言[M]//满族的社会组织. 高丙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
- [6]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 [7] 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纪录[EB/OL]. [2014-03-24]. http://www.seac.gov.cn/art/2004/8/4/art_2964_68485.html.
- [8] 杨圣敏,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六十年[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 [9] 大型综合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EB/OL]. [2014-03-21].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99773-1.htm>.
- [10] 中国修订再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EB/OL]. [2014-04-08].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12-24/2035063.shtml>.
- [11] 《中国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编委会. 黑龙江赫哲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C]//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19.
- [12]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编委会. 一项学者参与决策研究的可喜成果——《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序[C]//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8-12.
- [13] 麻国庆. 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J]. 学海,2007(1):25-35.
- [14] 王俊敏. 狩猎经济文化类型的当代变迁——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猎民生计调查[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57-64.
- [15] 孙崑. 外向型经济与沈阳近郊朝鲜族农村社会变迁[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6):47-50.
- [16] 闫洁.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深层次开发探析——以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民俗游为例[J]. 前沿,2013(23):174-176.
- [17] 吴相利. 基于小民族聚居地旅游开发的民族文化保护战略研究——以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民族乡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2006(1):196-202.
- [18] 朴金海. 朝鲜族农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6):24-28.
- [19] 朴金海.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朝鲜族村为中心[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5):42-49.
- [20] 赵淑梅.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的丧葬习俗及其宗教文化内涵——以室韦俄罗斯民族乡恩和村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6):166-169.
- [21] 郭淑云. 从“教乌云”看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教育——依据对吉林省九台市满族石氏家族的田野调查[J]. 社会科学战线,2009(3):198-203.
- [22] 杨荆楚. 东北渔猎民族现代化道路探索[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 [23] 苏艳. 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黑龙江省延寿县朝鲜族村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6):32-36.
- [24] 时春丽. 俄罗斯族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临江村为例[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8-52.
- [25] 祁惠君. 使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的民族学考察[J]. 满语研究,2006(1):98-105.
- [26] 谢元媛. 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后的状况调查[J]. 民俗研究,2005(2):50-60.
- [27] 满都尔图. 鄂温克人的“乌力楞”公社[J]. 社会科学战线,1981(1):208-216.
- [28] 都永浩. 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3):39-44.
- [29] 何俊芳.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6-70.
- [30] 包英华. 鄂温克族的婚姻家庭现状探讨——以乌兰宝力格嘎查入户调查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6):25-28.
- [31] 金炳镐. 黑龙江省朝鲜族村的人口发展和变化[J].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4):23-28.
- [32] 董玉芝. 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及其新农村建设模式——以黑龙江省朝鲜族村镇为中心[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1-76.
- [33] 崔海洋. 论朝鲜族农村空壳化的生态隐患——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现代社区变迁[J]. 生态经济:学术版,2009(2):55-58.
- [34] 朴婷姬. 中国朝鲜族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2):186-192.

(责任编辑 王莉)